



现代中国学的新范式

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加加美光行

序言 本文的课题

2007年3月，应日本学术会议主办的“‘地域研究’前沿——知的创立”研讨会邀请，我有机会参与了有关“地域研究”问题的讨论。与会的大部分报告者认为，在“地域研究”中，几乎不可能确立类似于其他学术领域中的专门科学所具有的那种普遍理论，尽管“地域研究”是跨学科的，但也不过是诸多学科在此相遇的“广场”（Arena）而已。¹我曾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地域研究”确立与其他学术领域不同的固有的方法论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²但是，目前的“地域研究”确实没有固有的学术性的方法论。正因如此，“地域研究”的英文名称 Area Studies 或 Regional Studies 只是被称作 Studies，而非地域学（Regionology?）。当然，被视为“地域研究”一个类别的中国研究也不例外。

从这一意义来说，假如中国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论，就应该考虑将名称改为“中国学”。就“地域研究”整体而言，同样也应该创造出“印度学”、“印度尼西亚学”、“泰国学”、“伊朗学”、“伊拉克学”、“肯尼亚学”等等。那样的话，“地域研究”名称自身就可以消失了。

我之所以主张“地域研究”应确立其固有的方法论，是基于这样一个理由。也就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地域研究”中存在着由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也即“未开化的东方”、“文明的西方”这种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导致的偏颇，而且这种弊端随着时间的演进愈加严重。本文将围绕这一问题重点阐述。

一、“地域研究”的产生和国策研究：政治含义

二次大战以后，世界与亚非地区（简称AA）³的关系开启了新的序幕，在194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的大约20年间，随着亚非地区的旧殖民地国家先后独立，美国对亚非地区的军事和经济影响（presence）远远超过了战前的旧宗主国。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东方世界与自由主义的西方世界相互对立的冷战时代也一起来到。

在此背景下，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J. K. Fairbank）、麦肯（Don Mckey）等人于1946年组织成立了“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Facult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Studies），并创立了称为“地域研究”的研究领域。⁴由于费正清是中国研究专家，中国研究也就成了“地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就美国“地域研究”的背景而言，被认为是基于战争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而产生

1 “特集1：‘地域研究’前沿——知的创立”，《学术动向》月刊2007年第6期，日本学术会议SIJ论坛。

2 在二战以后，最早论述“地域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是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林武和山口博一。见林武：“现代‘地域研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资料调查部，1969年3月；山口博一：“‘地域研究’论”，亚洲经济研究所，1991年3月。

3 抛开地缘政治的含义，本文将亚洲、非洲、中东和中南美洲的所有发展中国家统一简称为AA。

4 John King Fairbank, *Chinabound A Fifty-year*,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1982; 日文版平野健一郎、蒲池典子译：《中国回想录》，美铃书房，1994年7月。

的。比如与前述哈佛大学的费正清等人创建“地域研究”相关，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 J·康奈特 (James B. Conant) 在 1949 年曾这样说道：“在战争期间我们为军队发挥的各种作用中，包括对于占领地区的司政官那里送来的学生的培养工作。……它涉及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文化、地理以及经济的研究。由于充分认识到这些研究方法具有很高价值，目前在研究生院中实施了多少与此相似的相关地域研究计划，另外的一些计划也正在规划之中。”⁵

在这种适应战争需要背景的基础上，战后的“地域研究”进一步受到战后国际政治形势的影响，特别是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美国在确立冷战格局时对共产主义封锁 (containment) 政策的强烈影响。进而，以 1950 年 1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演说“中国的危机：美国政策检讨” (Crisis in China—An Examination of United States Policy)⁶ 为转折，出现了有关“是谁失去了中国” (Who lost China?) 的责任追究论争，国共内战期间 (1946—1949) 的美国对华政策受到批判。由美国参议员 J·R·麦卡锡掀起的号称“麦卡锡主义旋风”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对此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期间，费正清、奥温·拉特蒙 (Owen Lattimore) 以及因《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 而闻名的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等人，都因为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包容的态度而受到攻击。最后，1950 年 6 月爆发的朝鲜战争更是决定性地促成了这一潮流的形成。

1953 年，与朝鲜战争的停战几乎同时，美国的国防政策也发生了转变。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之后，杜鲁门政权时期由 G·凯南等人倡导的较为稳健的“封锁政策” (Containment) 被看作失败主义而遭贬斥，新的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多米诺理论” (Domino Theory)，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外政策进一步强化了反共色彩。与此相关，在整个亚非地区，美国开始取代英国、法国、荷兰等旧殖民地宗主国而正式展开了其军事扩张 (Commitment)。

另一方面，在战后的 50 年代，亚非地区的许多国家也接连脱离殖民统治而实现了政治独立，1955 年 4 月，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到 50 年代后期，从原法国属印度支那开始，美国强化了对整个亚非地区的军事扩张，与此相应的是实施经济援助，从而采取了强化亚非国家的依附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⁷

在冷战体制下，新殖民主义将亚非地区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囊括进其势力范围，从而将亚非拉 (AALA) 变成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扩张各自势力的狩猎场，并在多个地区引发了作为美苏之间的代理战争的“地域冲突” (Regional Conflicts)。而所谓“地域冲突”中的“地域”的称呼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它包含着这样一种世界观，也即不仅不承认在殖民地化之前已经存在的亚非

5 嘉治真三：“关于美国的‘地域研究’”，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第 3 卷第 4 号，1952 年 7 月。原载于 James B. Conant, *The College Curriculu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ident's Report*, 1946.

6 Dean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My Years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New York: W. W. Norton, Inc., 1969, pp. 355-358.

7 “新殖民主义”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 1961 年 1 月召开的第二届非洲人民会议上。见土生长穗：“新殖民主义与民族民主国家”，法政大学社会学部学会编：《社会劳动研究》14 (下)，1962 年 3 月；William H. Blanchard, *Neocolonialism American Style, 1960-2000*, Greenwood Press, Westport, Connecticut/London, 1996；亚非讲座第一卷《A·A·LA 与新殖民主义》，劲草书房，1964 年。

拉民众所在的国家 (Country, Land) 是与欧美诸国同样的政治主体, 而且在实质上 (无论表面上如何) 不承认这些国家在战后实现独立、确立主权之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构成单位。⁸

当然, 在费正清开始“地域研究”之初, “地域”概念不仅包括亚非地区, 也包括了欧美地区。但是在作为冷战时期的政治概念使用时, 就几乎限定于亚非拉国家, 而欧美诸国事实上被从其中排除了。例如, 50年代末到60年代, 英国·萨斯克斯大学的以“地域研究”为主的各研究科, 当初包含了欧洲、美国和古代中世纪等研究领域, 后来就逐渐将研究对象区域限定于东南亚、非洲和苏联。⁹

在上述背景下, 几乎与哈佛大学设立“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同时, 华盛顿大学也在1946年建立了“远东问题研究所”(Far Eastern Institute, 1949年改组为“远东俄罗斯问题研究所”, 即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到1948年, 受洛克菲尔财团的资助, 哥伦比亚大学又创建了以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为研究对象的“东亚研究所”(the East Asian Institute)。这样, 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地域研究”在美国各地纷纷出现。而到万隆会议召开、美国正式介入印度支那半岛的1955年, 作为对以费正清为中心的“国际与地域研究专门委员会”的继承, 哈佛大学又组织实施了“中国经济政治研究计划”(Chines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 后来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东亚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后改称 Fairbank Center for East Asian Research 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适应时代的要求, 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东亚“地域研究”开启了新的一幕。¹⁰

如前所述, 以中国研究为中心的“地域研究”, 其核心部分在最初即适应了美国政府安全保障政策的现实需求而被纳入其框架之中。随着肯尼迪政权取代艾森豪威尔政权, 1950年代后期开始, 冷战体制进一步强化, “地域研究”在依然保留其基础构成要素的同时, 进一步加强了“国策研究”的特征。¹¹也就是说, 作为自由主义盟主的美国高扬起防卫和势力扩张的旗帜, 与以苏联为盟主的社会主义阵营时而敌对、时而谋求共存, 世界进入了由美苏两国分割统治的时代。基于这种分割世界的需要, 以 AALA 为对象的“地域研究”就成了“国策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而其中自然容易看出视东方 (AALA) 为蒙昧、西方为文明的“东方主义”世界观在施加着影响。

基于以上背景, 我将第一阶段的“地域研究”概念界定为适应战后时代的需要、特别是美苏两国支配国际政治经济的需要而主要表现为“国策研究”指向的研究领域。

8 西方列强侵占原住民家园的历史不仅表现在 AALA 诸国, 也表现在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家园 (land) 的侵占。苏珊·小山:《美国印第安人: 死斗的历史》, 三一书房, 1995年。

9 约翰·D·雷格 (John D. Legge): “‘地域研究’——历史学者的见解”, 中岛岭雄、查尔曼斯·詹森编著:《“地域研究”现状》, 大修馆书店, 1989年。

10 石川忠雄: “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 日本外政学会《季刊外政》第4号, 1957年4月; “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 同第6号, 1957年7月; “华盛顿大学的中国研究”, 同第8号, 1958年1月。

11 关于这一时期美国的中国研究带有的浓厚国策研究色彩, 详见国分良成: “美国的中国研究”, 野村浩一等编:《现代中国研究案内》, 岩波讲座“现代中国”别卷2, 岩波书店, 1990年8月。

二、日本“地域研究”的出现及其政治含义

1. 中国研究所的设立与战后“中国研究”的启动

在美军占领下的日本，1946年1月建立了“中国研究所”，进而又以此为母体于1951年5月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建立这两个研究机构的核心成员主要是那些在战前和战争时期从“日中提携论”的观点置身于满铁调查部、东亚研究所等国策研究机关，以马克思主义左翼或“容共”的立场从事“支那学—支那研究”，而在战后带着某种赎罪意识重开中国研究的学者。但是从性质上来看，两个机构的“中国研究”当时并未纳入“地域研究”的范畴。因为如费正清40年代后期的研究所见的那样，美国的“地域研究”当初也带有容共的性格。问题在于，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学会的研究与日本政府之间并无人员和资金上的联系，这一点同战前的“支那学—支那研究”不同。因此，它不像美国的“地域研究”那样具有国策研究的性格。

但尽管如此，在中国研究所创立初期，确曾试图获得日本政府特别是外务省的支援，也即作为战前具有国策研究性质的中国研究的延续，设立一个左翼、容共的研究机构。具体来说，就是将战败前夕以近卫文麿为总裁而设立的、战后迅即被占领军司令部（GHQ）关闭的国策机构“日华协会”的资产，建立中国研究所。¹²

必须指出，在建立中国研究所的主要成员中，有很多人与近卫文麿有着较密切的关系。其背景在于，近卫既是与天皇家族有直接关系的五个摄政家族之一的近卫家族的掌门人，享有公爵爵位，同时在京都大学读书时曾受到日本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当时任京大教授）思想的影响，步入政界之后显示出较浓厚的容共色彩。例如，近卫曾经很看重后来因佐尔格事件被判刑的尾崎秀实（满铁调查部嘱托）等人，并当作亲信而予以重用。¹³与此相关，伊藤武雄和平野义太郎等人也曾在近卫的庇护下从事国策研究。

实际上，继承“日华协会”资产的计划因受到外务省（当时为“大东亚省”）的拒绝而未能实现，但得到了10万日元的援助资金，中国研究所由此启动。战败初期的日本外务省处于美国占领军的控制之下，不可能无视占领军司令部的意向而自主作出决定。

在中国研究所建立时的理事当中，平野义太郎、岩村三千夫、尾崎庄太郎、浅川次郎、中西功5人曾在30年代前期隶属于左翼研究机构无产阶级科学研究所，他们是日共党员、马克思主义左翼研究者。而其他理事有曾属于“日华协会”的伊藤武雄、具岛兼三郎，属于回教圈研究所的野原四郎、幼方直吾，这四人的政治立场也都是容共的，但他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者，而是相对的自由主义学者。¹⁴

基于上述背景，中国研究所在设立当初并没有明确树立马克思主义左翼的主张，而是保持了一种中间立场。比如1946年8月国共内战爆发时，第一任所长平野义太郎在旧制“一高”（第一

12 伊藤武雄：《在满铁的岁月》，劲草书房，1964年；伊藤武雄、野原四郎、齐藤秋男、岩村三千夫：“座谈会：中国研究所创立回顾”，中国研究所《中国研究月报》第344号，1976年10月。

13 宫西义雄编：《满铁调查部与尾崎秀实》，亚纪书房，1983年。

14 伊藤武雄：“野原四郎先生的学问和立场：中研30年的总结”，《亚洲经济旬报》1186号，1981年5月1日。

高等学校，原东京大学预科）的演讲中，仍然说“国共两党不可能开战”，对毛泽东的共产党和蒋介石的国民党都表示了支持。¹⁵而当因为参加中国的抗日战争闻名的鹿地亘（1939年9月在桂林组织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于1946年5月回国进入中国研究所之后，国民党的实情和国共内战的实况逐渐被获悉，中国研究所的立场也逐渐向左转，开始批判国民党，支持中共。¹⁶

在中国研究所出现上述转变的1947-1948年，适逢国际社会东西冷战体制迅速形成的时期。因此，可以说中国研究所的左转也较多地受到了其影响。而当1949年5月柏林被分割为东西两个部分、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研究所的左倾立场已完全确立。但也就在此时，美军（GHQ）的日本占领战策发生了大逆转，原来的容共、民主化、非军事化指向的立场转变为反共的军事战略。与50年代初美国的麦卡锡主义相呼应，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清共”运动。

另一方面，在同一时期，日本政府在美国的主导下开始着手战后处理问题，试图通过对日讲和的实现早日摆脱占领，恢复独立主权，而《旧金山讲和条约》的签订（1951年9月。1952年4月生效）使这一目标初步完成。但是，讲和以后，日本的主权独立依然只是名义上的，与和约同时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在实质上将日本纳入了依附于美国的框架之内，当然也使其内外政策增强了反共色彩。

在这样的背景下，采取容共立场、具有左翼倾向的中国研究所就完全失去了涉及日本国策研究的可能性，也难以意识到始自美国的“地域研究”的潮流并产生作为“‘地域研究’者”的自觉意识。

2. 亚洲政经学会的设立和日本“地域研究”的开始

1953年6月设立的“亚洲政经学会”使日本的“地域研究”逐渐浮出水面。这时《旧金山讲和条约》已生效一年，日本政府将摆脱美军的占领和恢复主权、发挥内外政策的自主性当作首要任务。当然，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在当时的东西冷战体制和日美安保体制决定了日本对美依附的状况下，这种恢复主权的要求终究难以实现，但作为一种强烈的主观愿望确实存在于国家领导层的意识之中。

1952年以后，在形式上恢复了主权的日本依然被迫依附和追随美国的现实状况，必然堵塞日本政府像过去的近卫文麿内阁一样采取容共政策的道路，而使其趋向反共。亚洲政经学会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的。它的作为一个学会的趋向，是同日本领导人在主观上恢复政策自主性而在现实中依附美国、走上反共道路的趋向重叠的。也正因如此，亚洲政经学会就带有实施国策研究的主观意图，从而成为日本“地域研究”的先导。

在学会设立时起到核心作用的理事当中，研究人员有植田捷雄、英修道、入江启四郎、板垣与一、原觉天、川野重任等人，政府方面有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中川融、课长小川平四郎，进而，

15 小島晋治、新島淳良、吉田富夫、石田米子：“座谈会：中国研究回顾”，《中国研究月报》421号，1983年3月。

16 同上，“鹿地亘访谈：以莱维·阿莱和抗日战争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545号，1993年7月。

经济界也有担任国策 Harp 副社长的水野成夫等人。从资金方面来看，得到了内阁官房长官调查室和外务省亚洲局的不同程度的资助，具有明显的国策研究指向的要素。

在后来亚洲政经学会成立30周年的纪念座谈会上，创建者之一的英修道在追述其成立的背景时，曾发表过有关对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感怀。据他回忆，在近卫文麿内阁上台的1937年左右，兴起了“重视亚洲”的风潮，而其中的领头人物有两个，一是属于国立大学系列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植田捷雄，而另一个就是英修道本人，属于私立大学系列的庆应大学。实际上，近卫内阁打出“重视亚洲”的旗号是在1938年之后，当年设立了中央机构“兴亚院”，近卫发表了名为“论东亚新秩序”的演讲。也就是说，上述二人在近卫的庇护下处于领导日本的亚洲研究的地位。在二人于战争期间已有合作的基础上，1951年旧金山和约缔结之后，植田向英修道提议将亚洲研究加以组织化。¹⁷基于这一背景，植田成为亚洲政经学会的首任代表理事。顺便强调，他在1930-1937年间曾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的教授，后来则作为外务省的“嘱托”加入关于中国、满洲的国策研究，同时也成为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嘱托”从事当时的中国研究（支那研究）。¹⁸

亚洲政经学会的另一位创建者板垣与一也具有代表性。他1940年起任东京商科大学副教授，负责讲授“殖民政策”课程，1942年12月作为该校东亚经济研究所代表团（团长为赤松要）的一员而赴新加坡，后来留在当地成为马来亚军政总监部的调查员，进而组织支援马来民族解放运动。¹⁹

由此可见，亚洲政经学会设立时的主要理事大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从事过日本的国策研究，这一事实显示了该机构作为一个学会组织的特征。

回过头来看，正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亚洲政经学会成立时的许多理事都有在近卫的庇护下从事国策研究的经历。它与中国研究所的区别在于，其研究的特点是否具备马克思主义左翼或者说容共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亚洲政经学会的理事们当中难以看出。与此相关，在其建立时的理事当中，代表了年轻一代的理事石川忠雄曾经在自传性的“回想录”中说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当日本学者中的多数人将此看作是历史的必然开始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时候，由于他本人对共产主义冷眼相看，因此能够保持对中共政权采取客观的和批判性的研究立场。进而，与他自己采取同样立场的年轻人还有东京工业大学的卫藤沈吉、东京大学的坂野正高和一桥大学的松村祐次等人，而在昭和30年（1955年）代以后，当对共产主义政权的批判风潮逐渐高涨之时，这批人的发言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²⁰其中卫藤在学会成立时也同石川一样担任理事。

石川所说的共产主义批判的风潮大概是指下述状况。也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受中国革命影响的日本共产党从50年代开始采取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革命战略。结果

17 英修道、板垣与一、川野重任、石川滋、卫藤沈吉等：“座谈会重录：亚洲政经学会的三十年”，财团法人亚洲政经学会：《亚洲政经学会的四十年：1953-1993》，1993年10月，36-37页。

18 “植田捷雄教授略历·著作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7号，1965年3月。

19 板垣与一：《坚守自我》，文艺社，2004年。

20 石川忠雄：《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缠》，小学馆，1997年，78-80页。

日共党内的“所感派”和“国际派”之间的派性对立被激化，私刑和审查一度盛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55年7月，日共第6次全国协议会（六全协）试图放弃武装革命路线而转向和平斗争，但由此给党内带来了巨大冲击，许多人纷纷退党。在这种混乱中，针对共产主义特别是日共的怀疑和批判舆论由此兴起。随后，在斯大林去世3年之后的1956年2月，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对斯大林进行了严厉批判，并披露了斯大林的独裁所导致的大清洗状况。这进一步强化了对于共产主义政治集团或政治权力的强烈怀疑和批判。

实际上，在前述冷战体制强化、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特别是针对亚非拉诸国的反共、反华性质的干涉政策（多米诺理论）背景下，置于日美安保框架内的日本所采取的更加明显的反共立场，也推动了针对共产主义的怀疑和批判的舆论。

当然，对共产主义采取批判的和客观的立场，与反共产主义的立场原本是不同的。卫藤沈吉在纪念亚洲政经学会成立30周年的座谈会上曾这样说道：

“据我所闻，在1950年代初期，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学研究会、中国研究所、现代中国学会等战败之后成立的学术组织，都被日共或马克思主义者掌握了领导权，以明确的政治倾向开展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倾向于实证研究的亚洲研究者，抱着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创建一个学术性学会的目的建立了亚洲政经学会。”

针对卫藤的发言，板垣回答道：“尽管如此，（亚洲政经学会）也没有排除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它成还是一个自由的场所。”而英修道则说，“并没有故意要排除。应该说是由于我们掌握了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者近来也没啥关系。”²¹也就是说，在板垣和英修道二人看来，亚洲政经学会虽然聚集了许多对共产主义“冷眼”批判的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但是其立场并不是反共的，毋宁说是容共的。

但是，当考虑到日本内外的政治状况的时候，亚洲政经学会的立场就不能不抛弃容共的色彩而实质上转向反共产主义。这当然也使亚洲政经学会的研究更接近于美国的国策性的“地域研究”。事实上，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不久就高度关注美国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的动向。例如，首任代表理事植田捷雄在1953年9月到1954年8月的一年间，先后访问了美、英、法、德、意、荷兰、瑞士和印度八国，回国后在《历史教育》杂志上发表了“美国的中国研究”，进而在《美国人》杂志刊登了“美国的亚洲研究”。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²²在战后，美国为了适应与苏联的严重对立而进行了苏联研究，同时将中共政权在中国大陆的出现看作美国自身的失败，作为苏联研究的一部分而探索对华政策也非常必要，于是出现了中国研究。结果，包括费正清和本杰明·舒华兹等亲华派学者在内的大部分中国问题研究者的看法是，中国的共产化不可避免，而且不可能采取“铁托化”的与东西方保持同等距离的不结盟政策。

在植田回国不久的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美国的中国研究正式启动。大约在1年之后的1957年7月，亚洲政经学会的年轻理事石川忠雄留学前往哈佛大学留学，一年多

21 “座谈会重录：亚洲政经学会的三十年”，前引文献37-38页。

22 植田捷雄：“美国的中国研究”，《历史教育》1954年12月号；“美国的亚洲研究”，美国大使馆文化交流局出版科《美国百科事典》第二卷第2号，1956年。

后回国，同样对美国主要大学的“地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的实况进行了详细介绍。由此看来，成立不久的亚洲政经学会对美国的地域研究特别是中国研究高度关注，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展开了日本自己的地域研究。

亚洲政经学会成立不久，受朝鲜战争“特需”的影响，日本经济异常景气，终于迎来了战后的复兴。与此同时，以逐渐壮大的经济实力为背景，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开始更加调专门从事亚洲问题研究的必要性。这也同样推动了亚洲政经学会的活动。²³不过，在日本学术界最初使用“地域研究”的并不是亚洲政经学会，而是50年代末设立的亚洲经济研究所。

3. 亚洲经济研究所的设立与“地域研究”

1957年7月，在岸信介首相的秘书藤崎信幸（在满洲时代曾因岸信介的关系进入当时的亚洲问题调查会）的介绍下，亚洲政经学会的核心理事板垣与一、原觉天和川野重任等人与岸信介在箱根举行了会晤，建议设立亚洲经济研究所。²⁴板垣等人的建议是要设立一个国策性的研究机构，他本人在战争期间的马来亚军政时代并非单纯的学者，而是同时具有“实践”国策意图的亚洲问题研究者。这一点在其1962年出版的《亚洲的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中得到如实反映。²⁵

板垣在会谈时对岸信介说，战后亚洲的经济发展受到了追求独立和自立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支持，因此日本对亚洲的经济技术援助必须有助于这种自立发展的精神，并且以此为基础。而要推进这项事业，必须培养熟悉亚洲的历史和现状又具有热情的人才。岸信介接受了这一建议，1958年1月，亚洲经济研究所以通产大臣认可的形式正式建立，以培养“地域研究”人才为目标的AALA研究由此开始。

在这之后，板垣受洛克菲勒财团的资助赴海外访学。从东京大学退休的东畑精一1959年担任首任所长。关于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发展方向，他比板垣更重视基础研究。东畑所考虑的培养研究人才的途径是，首先通过当地留学或实地调查等形式获得有关亚非拉的历史和现实的基于实感的知识，然后进行理论化的尝试，最后再发展到政策研究层面。²⁶实际上，从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除了中国研究领域之外，日本学术界异常缺乏有关AALA研究的人才。为此，东畑没有采取“首先从事国策研究”的设想，并且据说以此作为接受岸信介要求其担任所长的条件。²⁷

众所周知，岸信介具有摆脱对美依附、重建一个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具有自主性的日本的强烈

23 东畑精一：《吾师、吾友与吾之学术》，柏书房，1984年，175-176页。

24 板垣与一编：《向亚洲寻求出路——藤崎信幸追悼文集》，论创社，1985年；小林英夫：《满洲与自民党》，新潮社“新潮新书”，2005年。

25 板垣与一：《亚洲的民族主义与经济发展》，东洋经济新报社，1962年。我于1963年阅读了该书，它对我进入中国研究领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26 东畑精一：“亚洲经济研究所的研究计划”，《经团联月报》第7期第9号，1959年7月；前引《吾师、吾友与吾之学术》，175-176页。

27 加加美光行：《中国：政治与社会》，亚洲经济研究所“地域研究丛书”第4卷，1995年2月，23-24页。例如，在亚洲政经学会的机关刊物《亚洲研究》第4卷第4号（1962年1月）就刊载了石川忠雄的论文“美国的中国研究”。

愿望。他在其回忆录²⁸中这样说道：

“位于亚洲的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日本，必须积极开展亚洲外交。为此有必要掌握那些新兴国家的实际状况，同各国首脑进行亲切会谈，了解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希望是什么，想排除什么。我坚信，依据这些知识和体验与美国进行会谈，访美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果。提高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也即凸显亚洲的中心是日本这一点，有助于强化我同艾克（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谈判时提出重建对等的日美关系的主张。这就是我的判断。”（下划线及括号内文字为笔者所加）

如此看来，岸信介之所以接受了板垣的建议，带有使作为亚洲盟主的日本摆脱对美依附的宏大意图。其中也包含了修改和平宪法（宪法第9条）、重建日本军备的想法。

当然，由于岸信介在1960年的反安保运动中下台，他的上述意图实际上遭遇了挫折，未能看到摆脱对美国的依附。由此看来，尽管亚洲政经学会和亚洲经济研究所具有成为国策研究机构的方向定位，但结果并未能如愿。

因此，虽然说这两个机构当初得到了日本政府和经济界的支持，但初期的“地域研究”者们并没有处在直接介入制定外交国防政策和经济援助合作政策的立场。就此可以说，与战前和战争期间的满铁等国策研究机构相比，他们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的研究。但尽管如此，由于植田、英修道和板垣所代表的创始者们对战后世界具有敏锐的时代感，而且在主观上具有开展国策研究的实用主义意图，两个机构的研究仍然合乎“地域研究”之名。

4. 亚洲经济研究所的“地域研究”论

在亚洲经济研究所成立大约10年后的1966年左右，围绕“地域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该所内部出现了较为活跃的讨论。最早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当时担任调查研究部副部长的阿拉伯中东问题专家林武。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主张。²⁹

林武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于顺利推进战争的需要而被动员起来从事世界各民族和地区研究的欧美的学者、大学教授们，只具有极端贫乏的知识和不正确的判断，未能取得所谓“顶用”的成果，战后的地域研究正是在对此加以反省的基础上开始的。而当时知识的贫乏和判断错误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第一，社会科学（discipline）领域的各个学科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的专门化和细分，“弱化了我们对于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的整体性把握。”第二，作为研究对象的民族和地区主要是“非西欧世界”，这决定了既有的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清晰明了。

在林武看来，作为现代科学一部分的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其研究对象是现代化了的均质性的“西欧世界”，学科的专门化和细化当然有助于对“西欧世界”的分析阐释。但是作为战争期间研究对象的“世界”，却是同“西欧世界”相异的、带有非均质性和多样性的“非西欧世界”，因此细化了的现代社会科学各领域从“个别把握、单一学科”的角度就难以有效地把握其现实状况。

28 岸信介：《岸信介回忆录》，广济堂，1983年，312页。

29 林武：“寄语‘地域研究’论——为了现代的社会科学研究”，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通信》第8号，1969年12月。

在此情况下，作为“非西欧世界”研究的地域研究，就需要对于对象世界的“综合性把握”（interdisciplinary）和“地域”整体的完整理解。

林武进而认为，现代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在于，它的成立本身就是“西欧现代世界”（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在与“非西欧世界”（东方社会）相遇时通过自身的扩张而吸食了后者的结果。也即由此确立的世界认识的“理论和体系”陷入了泛大西洋地区中心的西欧中心主义（Olympia complacency），因此对“非西欧世界”的认识就只能以实用主义的无效性为归结。要建立充分完整的“地域研究”，必须打破现代社会科学对两个世界加以分割、区别，并抬高前者贬损后者的“制度性配置”这一前提，克服对“世界”缺少整体综合把握的弊端。

可以看出，林武在这里揭示了后来由萨伊德等人于70年代提出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问题。

三、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的“地域研究”和“中国研究”

1. “地域研究”批判和新的视角：美国霸权和东方主义批判

在林武最初指出“地域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的60年代后期，美国的“地域研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艾森豪威尔政权处于顶峰时期的50年代后期，美国的地域研究中将当代中国看作“极权主义”的趋势逐渐增强，带有明显的反共产主义色彩。但是到了50代末的政权末期，以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为契机，开始探索美中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反共色彩一时变得薄弱，较为自由的研究空间得以扩展。此外，中国在1956-1957年开展的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特征的思想文化领域的自由化运动，以及中共八大对针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否定，也强化了上述趋势。但是，由于随后的反右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剧烈变化，经济界进一步要求对当代中国进行彻底的研究，作为“地域研究”一部分的“中国研究”得以强化。其中福特基金会对中国研究提供了巨额的资金资助，仅1961年就拨款447万美元，³⁰同时还向日本东洋文库的现代中国研究提供了17.3万美元（相当于当时的6200万日元），作为资料和情报收集经费，并在日本的“中国研究”界引发了对于这笔款项是否应该接受的争论。³¹

受此影响，美国的“中国研究”的分析框架不再限于“极权主义”路径，出现了包括对当代中国予以肯定的多样性研究。³²不过，总起来看，其中仍然普遍存在着将西方的现代当作典范的“现代化论”视角。

使上述状况发生重大改变的是下述一系列的形势变化。兴起于50年代后期的黑人公民权运动进入60年代之后迅速高涨，1965年爆发的“越南战争”陷入僵局引发了剧烈的反战运动，进

30 转引自国分良成前揭论文，原文载于 John Lindbeck, *Understanding China: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 Resources*, Preager Publishers, 1971.

31 参照《亚洲经济旬报》第511期（1962年8月1日）刊载的山口健次、铃木良以及光冈玄的论文。

32 Michel Oksenberg (迈克尔·奥库塞), *Sources and Methodological Problems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n A. Doak Barnett (ed.), *Chinese Politics in Ac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9.

而还有1966年爆发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象征着转变的标志是1968年成立的CCAS (The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例如, CCAS的成员詹姆斯·派克 (James Peck) 认为, 正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论”视野的中国认识, 支撑了战后美国的美国霸权性质的(帝国主义的)亚洲(AALA)战略, 并促成了以多米诺理论为代表的对华政策。

派克认为其中的主要问题有两点。第一, 美国的地域研究带有浓厚的国策研究特征, 因此它参与了冷战体制下美国的外交国防政策特别是对AALA政策。这种参与虽然也包含了政策批判, 但多数是政策支持性的积极参与。而既然这种政策自身被证明是错误的, 那么就必须对积极参与这种政策的“地域研究”进行批判。第二, 冷战体制下美国的AALA政策明显带有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防卫和扩张的目的。而这种自由主义打上了西欧现代的世界观(现代主义、现代化逻辑)的浓厚烙印, 将西欧和非西欧看作“文明与野蛮”的东方主义(西欧中心主义)意识在其中作祟, 导致了针对AALA的统治从殖民主义转向新殖民主义, 也即美国霸权。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针对黑人的压制可以看作是其象征。他主张, 必须对这种建立在西方现代的世界观基础上的“地域研究”进行彻底批判。

以上两点为依据的由CCAS代表的学术界的新的潮流, 不仅将批判矛头指向了美国的政策, 也指向了支撑战后美国政策的地域研究本身。例如, 詹姆斯·派克也将费正清列为批判对象, 他认为, 尽管费正清是“自由的”而且没有放弃支持中国的立场, 但依然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从结果来看有助于进行自由主义防卫和扩张的美国霸权的确立。当然, 费正清本人对此进行了反论, 坚持说自己并没有卷入美国的对华政策, 而是站在政策批判的立场, 但是派克始终将其作为西方现代的拥护者而继续予以批判。³³

前一节所说的由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林武提出的“地域研究”反思, 实际上也受到了美国学术界的这种时代潮流的影响, 同时也与日本国内兴起的类似潮流(“超越现代”主张的重提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有关。当然, 无论是CCAS还是林武, 在批判既往的“地域研究”的同时, 并没有否认“地域研究”本身的存在。因为即便既有的“地域研究”难以避免国策指向的特征, CCAS和林武的观念中的“地域研究”也带有通过批判国策来通往新的政策的实用主义色彩。也就是说, 他们所追求的是不要错误地影响国策, 而是基于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弊端、打破世界霸权体系这一视角而展开的新的政策指向的实践性“地域研究”。而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前期兴起的这一时代潮流, 引发了70年代中期以后东方主义批判和解构思潮的勃兴。

2. 东方主义批判和解构的视角: 在“地域研究”中的反映

1978年, 萨伊德(1935-2003)指出了“亚洲研究”中普遍存在的东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的问题。受其影响, P·A·柯文的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于1984年问世, 该书批判地分

33 转引自国分良成前揭论文。原文载于 John Fairbank and James Peck, An Exchang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April-July, 1970.

析了“中国研究”中同样存在的东方主义问题。³⁴在迄今为止的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东方主义”为题的著述不断出现，其中从方法论上探求“当代中国学”或“亚洲学”的论述也并不少见。³⁵但必须承认，克服了“东方主义”弊端的真正的“当代中国学”和“亚洲学”实际上至今并没有确立，现实中的中国研究、亚洲研究，以及“地域研究”整体的世界认识依然继承着“东方主义”的衣钵。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何在呢？

以70年代后期为界，世界思想界步入了从列维·斯特劳（1908-）的结构主义向着米歇尔·福科（1926-1984）的后结构主义，以及J·德里达（1930-2004）的“解构主义”的转变，也即强调始于E·胡塞尔的还原主义理论。³⁶

胡塞尔将人们的世界认识结构与世界本身的存在结构称之为“共同主观性的存在结构”（Structure of the Being on Inter-subjectivity），进而强调了对人们意识中固定了的“结构”进行还原（还原到结构化以前的原貌）的方法的重要性，其方法就是对“共同主观性的存在结构”的认识“放弃判断”。³⁷“东方主义”当然可以说是这种结构的一个典型。一般而言，始于胡塞尔的“放弃判断”的方法论被称为现象学的还原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德里达、萨伊德和柯文等人的还原主义。³⁸

因此，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批判，可以看作同一时代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思潮的一部分。众所周知，“解构”的着眼点在于摆脱既有的思想构造物的束缚，或者说将其加以破坏，而在离脱和破坏之后建立新的思想构筑物本身成为批判的对象。从这一意义上看，柯文1984年提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与德里达的“解构”有着不同的旨趣，他明显是要在摆脱和破坏既有研究中的“东方主义”之后建立新的“中国研究”的方法论。

此前的中国研究大多强调，在世界近代史上，由于“西方的冲击”（Western Impact），导致了东方和西方世界在东西方向的横轴上形成了一种差异极大的空间的结构化。而单纯强调“西方的冲击”造成的空间结构化，必然会忽视或遮蔽东方与西方同样具有的由独自的历史发展过程形成的纵轴方向的时间结构，柯文所说的“历史发现”就是对这一问题的批判。他进而指出，只有发现中国独自的作为时间轴（纵轴）的“历史发展过程”，才是克服东方主义弊端的有效方法。

34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Georges Borchardt Inc, New York, 1978. 板垣与一等译：《东方主义》，平凡社，1986年；Paul A. Cohen,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佐藤慎一译：《知的帝国主义：东方主义与中国像》，平凡社，1988年。

35 弥永信美：《幻想的东方——东方主义的系谱》（上、下）筑摩书房，2005年；驹井洋：《超越东方主义的社会智慧——非东方主义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米涅瓦书房，1998年；中村则弘：《超越东方主义与日本的内生性发展——东亚视点》，东京情报出版社，2005年；青木保：《逆光下的东方主义》，岩波书店，1998年。

36 堀荣造：《胡塞尔现象学的还原》，晃洋书房，2003年。

37 广松涉：《世界的共同主观性存在结构》，劲草书房，1972年；Soren Overgaard, *Husserl and Heidegger on Being in the World*, Kulwer Academic Publishers, 30, Apr., 2004, 特别参照 Chapter 5。

38 如同后文所述，由于“共同主观性”概念较为偏重主观的静态的（static）一面，而忽视乃至轻视了动态的（dynamic）的目的和意志，因此本文在较多地吸收其内涵的同时，改称“共同态度性”（Co-behaviorism），以此作为现代中国学方法论的核心概念。参照加美光行：《镜中的日本与中国：中国学与共同态度性的视角》，日本评论社，2007年。

尽管柯文提出的问题不到10年就变成了学术界的常识，但“东方主义”在不断被强调的情况下依然未被克服。结果是不仅今天的“地域研究”学界，就连一般的社会意识中也继续存在着“东方主义”的弊端。其根本原因又在哪里呢？

在我看来，不仅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即使就萨伊德和柯文而言，也都带有这样一种浓厚的倾向，也即尽管他们试图用还原主义的方法来消解观念世界中的东方主义的错误认识结构，但同时却对打破现实世界的东方主义性质的存在结构几乎毫不关心。也就是说，对于由美国霸权所决定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实世界政治结构，缺少予以破坏的实践。这一点多少受到了德里达的影响，同时也是70到80年代的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整体特征。³⁹实际上，70年代后期以降全球范围内“没有哲学、无思想的时代”的到来并非没有原因。

另一方面，如果关注现实世界的存在结构的话，我们将会看到，尽管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NIEs）乃至东盟（ASEAN）的崛起，但是“依附化”和“边缘化”的结构动力（认识结构与存在结构）不仅没有衰弱，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其强度和复杂性。今天，对“依附化”、“边缘化”进行实际抵抗的仅限于伊斯兰教世界，而与此相关，在学问的世界中，“东方主义”的弊端则被不断有力地再生产。

这一事实表明，如果不能打破作为现实世界存在结构的东方主义的“持久的扩展能力”，那么也就难以“解构”作为观念世界认识结构的东方主义。考虑到老一代逐渐过世或衰老，而70年代中期以后成长起来的（他们不了解“安保斗争”和“全共斗”之类的思想是与现实实践紧密结合的）年轻一代占据人口的多数，事态实际上更加严峻。

竹内好曾经警告说，“西方式的现代”的无止境的“自我扩张和自我实现”，将同时会相应强化亚洲的“持续的失败”，进而，如果缺少建立在对“失败”进行深刻觉悟基础上的“抵抗”（挣扎=抗争），亚洲甚至不可能成为亚洲，必然导致“自我丧失”。⁴⁰竹内好所说的“抵抗、抗争”，当然意味着不仅在观念世界（认识结构），而且在现实世界（存在结构）中对“西方的现代”予以抵抗。1989年冷战体制的崩溃，以及后来国际局势的演变，充分证明竹内好的预见是正确的。关于这一点，自70年代后期至今接连出现的NIEs、ASEAN、乃至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来的经济“起飞”现象，与其说是亚洲克服了“西方”，不如说正是“西方的现代”的“自我扩张、自我实现”。

而“地域研究”的世界当然也受到这种时代变化的深刻影响。

3. 引发“东方主义”批判的时代状况

1960年代后期爆发的越南战争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都促进了对于亚洲、非洲或第三世界⁴¹

39 例如继浅田彰的《逃走论》、《结构的力量》以及国铁（现在的JR=日本铁道株式会社）编写的“佳日出行”、“发现日本”之后，80年代后期由五木宽之提出的“复制异国情调的日本”等，即是其典型。

40 竹内好：“现代是什么：日中比较”，《现代中国论》，河出书房，1951年9月。

41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的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比于1952年提出的。见 Alfred Sauvi, *Trois Mondes, une planète*, L'Observateur, 14th aout 1952.

的独自发展道路的重新认识，引发了对于将欧美现代的自由主义价值视为普遍的偏向的批判。进而，50年代末开始的产生了世界影响的美国的黑人公民权运动和新左翼运动等也对此起到推进作用。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日本，席卷全国的学生运动（“全共斗运动”）也出现了对于“战后民主主义”的批判，认为它不过是“虚幻”，⁴²是追随美国自由主义的日本战后现代化道路的产物。而正是日本对于美国的追随，导致了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爆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矛盾，例如，随着高速工业化而在“合理化”名义下对工人的大量解雇所引发的“三池争议”、“夕张争议”，水俣病、骨痛病、反应停导致的畸形婴儿等四大公害、药害和医疗事故，对农业和渔业的抛弃，成田机场农地征用引发的抗争运动，以及城乡差距所表现的二元结构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正是批判追随美国政策的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在60年代后期的日本，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反越战运动，进而大多数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支持毛泽东在中国发动的文革，成为“文革礼赞派”或“毛泽东礼赞派”。从中可以看出一种与美国的现代主义（modernization）背后存在的带有美国霸权和欺骗性的民主主义进行正面对抗的“新人”类型，恰如“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中国的红卫兵造反派。⁴³而后现代思潮在70年代以后之所以被迅速接受，也是由于现代主义批判这一时代潮流的影响。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60年代末，缪尔达尔在《亚洲的戏剧》中批判了发达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在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⁴⁴时只是从纯经济角度考虑发展的发展主义倾向，强调从政治、社会、文化等角度综合看待亚洲的必要性。⁴⁵以此为契机，70年代以后出现了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S·阿明、A·G·弗朗克的“周边资本主义理论”和“依附理论”，⁴⁶直至沃尔斯坦的“中心—边缘”理论，⁴⁷对于亚非诸国由于受到欧美诸国的外生性的“依附化”和“边缘化”的压力而产生的诸多扭曲（经济、政治、和意识结构上的扭曲）现象不断地加以批判。

42 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新曜社，2002年；松田道雄：“战后民主主义是一种虚幻吗？”《世界》1987年11月号。

43 当然，在60-70年代，也有像吉本隆明那样既对战后民主主义表示疑问，也对反越战和礼赞文革、毛泽东持批评立场的人士。

44 在1960年这一年，在非洲的17个国家先后实现独立的同时，由美国的盟友控制的联合国在美国的主导下提出了“发展的十年”口号，企图通过对第三世界的新兴独立国家的发展援助来获得其支持。缪尔达尔的主张也是对这一趋势的批判。

45 G. Myrdal,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3 volumes*, pantheon, 1968. 该书原版于1963年，1968年出版修订版时又收入了作者60年代中期的著述。小浪、木村等译：《亚洲的戏剧：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上、下），东洋经济新报社，1974年。

46 Samir Amin, *Le Developpement Inegal: Essai sur les Formations Sociales du Capitalism Peripherique*, Paris: Editions de Minuit, 1973. 西川润译：《不均衡发展——关于周边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体的研究》，东洋经济新报社，1983年；Andre Gunder Frank,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ile and Brazi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日文版为大崎、前田、中尾灯译：《世界资本主义与不发达——掠夺的“中枢—卫星”结构》，柘植树房，1976年。

47 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tudies in Modern Capit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1979. 藤濑、金井、麻沼译：《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心与周边的不平等》，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87年。

上述一系列批判也揭露了欧美诸国自17世纪的黑人奴隶贸易开始对亚洲和非洲实行的长达350年间的殖民统治，并呼吁要打破这种统治结构。实际上，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第一届亚非会议”，就呼吁当时的亚非国家通过各自的政治独立来摆脱殖民统治。而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依附理论”和“边缘化理论”强调，后殖民主义通过更巧妙地促使政治独立后的亚非国家的依附而演化成新殖民主义，呈现出新的殖民形态。

但是，70年代后期由萨伊德和柯文开展的“东方主义”批判则指出，恰恰由于阿明和弗朗克等人的“依附理论”和“边缘化理论”对西方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的批判过于性急，其世界认识中反而带有较多的“西方中心”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东方主义”的批判自身也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的认识结构，从而表现为一种悖论。

就中国研究来看，“依附理论”和“边缘化理论”不仅从认识论上揭示了19世纪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之后西方与东方的“支配与依附”化、“中心与边缘”化的结构，而且带有从实践上打破这一结构的意图。阿明等人所受到的毛泽东思想的深刻影响，也正是表现在“依附理论”带有打破依附和被依附这一世界关系结构的实践性意图上。但是，从萨伊德和柯文的角度来看，可能正是由于“依附理论”和“边缘化理论”带有的这种实践性意图，在有关世界认识的意识结构上反而固化了东方—西方的空间定位，而未能避免将其看作前提。

在这一时期的“中国研究”界，前述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学会的成员中之所以出现了许多文革或毛泽东的支持者，也是由于他们从日本社会的现实中发现了有助于美国霸权的依附—被依附的世界统治结构的要素，从而带有强烈的批判意识。新岛纯良、菅沼正久、藤村俊郎、齐藤秋男和山内一男等人可以说皆位居其中。吉田富夫曾在1983年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正是由于“看到了日本社会当时孕育着巨大的矛盾、处于一种不能不寻求创造新人的状况”，因此才“梦想着中国革命中存在着创造新人的可能性。”⁴⁸尽管这种批判并没有使用“东方主义”概念，但实质上带有批判东方主义的意图，认识到了将东方与西方严加区分的空间意识结构也即世界认识结构的固化所存在的问题。这一点与阿明和弗朗克相同。

4. 后越战、后文革时代的状况与“东方主义”批判的衰微

不过要强调的是，支持文革或毛泽东的大部分研究者并没有将自身看作是“地域研究者”。在当时的状况下，具有将自己看作“地域研究者”的认识的人基本上限于亚洲政经学会和亚洲经济研究所的成员。⁴⁹

但是当7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和文革结束之后，这一潮流就骤然发生了变化。1978年12月，实现了南北统一之后的越南同邻国柬埔寨开启战端，翌年2月，中国以“惩罚”的名义对越南发

48 小岛晋治、新岛淳良、吉田富夫、石田米子：“座谈会：中国研究回顾”，《中国研究月报》421号，1983年3月。

49 当然，在意识到自己是“地域研究”者的学者中，也有文革和毛泽东的支持者，如亚洲经济研究所中国研究小组的小岛丽逸、小林文男、矢吹晋和作者本人等。

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者有助于美国从越南撤出之后的阴谋的实现（以亚洲人攻打亚洲人）。⁵⁰而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则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时文革的惨剧被正式公开。这一系列事件促成了上述转变。

越南的改革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放弃了此前两国所坚持的独自的社会主义道路，而试图向着自由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进行180度的巨大转换。其中自然已经难以看到与西方现代进行对抗而坚守亚洲独自的现代化道路的立场。在此背景下，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中国研究领域曾经的文革和毛泽东支持者开始受到猛烈批判，被指责为“无视文革的现实，单纯地美化中国和毛泽东”，他们不得不保持沉默。⁵¹进而，在此前后，当初对文革和毛泽东持怀疑立场的许多年轻学者加入了亚洲政经学会，从而出现了中国研究界的大部分人卷入“地域研究”的状况。与此同时，“现代中国学会”的存在意义也发生了动摇。⁵²

在上述过程中，有关“地域研究”的方法论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认为那些倾向于反对越战、赞美文革等的现代主义批判的亚洲研究者和中国研究者陷入了善恶二元论或基于主观价值判断的理想主义（Idealism），因而在“客观事实认识”上犯了重大错误，这样一种认识占据主流。相反，认为实证主义的、排斥主观价值判断的现实主义（Realism），也即客观研究才具备把握客观事实的能力和较强的预见性。这种观点在战争时期的满铁调查部和东亚研究所的国策性研究中就为末广严太郎、中西功、平野义太郎等人所主张，在“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支那抗战力调查”期间进一步被强调，⁵³而它在战后被那些基于自由主义立场的研究者更多地继承，比如在亚洲政经学会成立时，代表着年轻一代学者的理事卫藤沈吉和石川忠雄等人就明确强调“实证主义”和“排除价值判断的冷静的状况认识”等等。

实际上，无论是在战争时期还是在战后，亚洲政经学会的创立者们的研究都具有浓厚的国策研究色彩。但在1952年以后，当日本在脱离美军占领、恢复独立主权之后依然被迫依附于美国而难以自主决定其内外政策时，与国策研究相比，“实证主义”的方法更加受到重视，而亚洲政经学会也就变成了这些人云集的学会。不过，到了70年代，学会的创立者之一板垣与一在似乎要对这种趋势进行批判时，再度强调了地域研究中主体性的目的指向的重要性，他说：“必须认为，对于特定地域的特定问题，只有研究者明确树立实践的和主体性的课题意识才是最为重要的。……对于地域研究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发现那些基于地域的主体性的课题。”⁵⁴

板垣的意思是，地域研究需要研究者的主体性，也即在一一定的目的意识下对于研究对象国家状况的关注和影响。其中明显包含着对于单纯偏向实证主义的无主体性、无目的性研究的批评。

50 巴吉尼亚·布劳德、马克·塞尔登编著：《尼克松·基辛格的阴谋》，现代评论社，1973年。该书认为，从越南撤退后美国的亚洲安全保障战略在于使亚洲人与亚洲人开战。

51 展开这种批判的代表人物有中岛岭雄、丸山升、西义之、永井阳之助、辻村明、野泽宽等人。

52 在19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小岛晋治任理事长的中国研究所，也处于这种危机状况之中，当时研究所的存在意义及其改革问题经常在理事会上被提出。笔者当时作为该所的理事也参与了这种讨论。

53 关于这一点，可参照加美光行：《镜中的日本与中国：中国学与共同态度性的视角》（日本评论社，2007年）第一章。

54 “特集：亚洲研究的课题和方法”，《亚洲研究》第17卷第2号，1970年7月，121-122页。

但在实际上，在60年代到70年代前期的以越南战争为代表的世界政治剧烈变动的季节，标榜“实证主义”的研究者们也是基于一定的目的意志和价值判断（具体来说是自由主义）而从事研究的，对此难以加以否认。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那些标榜“实证主义”的研究者们开始标榜起另外一点，也即从主观上否定自己的研究中存在着基于某种目的和意志的价值判断的事实，好像通过实证研究来摆脱意识形态、排除目的性的价值判断是可能的。这一倾向在越南战争和文革结束之后的70年代末以后更加明显。

当然，日本的地域研究中的上述趋势与美国的地域研究状况并不相同，后者一贯带有国策研究的指向，没有必要从方法论上否定其中存在着基于自由主义的价值判断。当然，从方法论上来看，这种价值判断的存在与实证主义具有何种关系并没有被自觉认识和注意。

四、新的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1. 东方主义的再生产

尽管“亚洲研究”和“中国研究”中存在的东方主义自70年代末以来不断地受到批判，但从结果来看，它至今仍然以一种强有力的结构形态而存在。其原因在于，这种批判虽然指向了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但却带有诸多缺陷，同时缺少打破其作为存在结构的实践性行动。下面将对此详加论述。

第一个问题在于对东方主义认识结构批判的不彻底性。

许多从事地域研究的研究者，与其说是把自己看作“地域研究”者，毋宁说更多地自认为是政治学者、经济学者、教育学者、社会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历史学者等属于专门科学（discipline）的研究者。因此，将自己从事的“地域研究”看作某个专门学科的“应用领域”或“实证场所”的倾向较为牢固。如同本文开首所指出的那样，仅把地域研究当作诸种科学相遇的“广场”（Arena），认为它本身并不足以成为独立的专门学科，今天的一些“地域研究”者所抱有的这种见解，正是上述看法的反映。尽管一部分人在自己的研究履历中会记入“现代亚洲论”、“现代中国论”等名称，自认为属于“地域研究者”的学者有所增加，但仍然属于少数。

这一点与东方主义的关系在于，东方主义批判只是针对“亚洲研究”、“中国研究”，进而“地域研究”领域的“文化人类学”或“历史学”的，而没有指向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既成的专门科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中不存在扭曲的东方主义认识结构。它们之所以在实质上能够免于批判，是因为在被当作“应用领域”或“实证场所”而从事的地域研究受到东方主义批判的时候，也是研究者能够从这一领域安全撤退而回归避难的安全堡。换言之，东方主义批判不仅应针对地域研究，也必须指向所有的专门学科领域，否则就难以打破作为东方主义批判要害的认识结构。而事实上这一结构也的确未能被打破。

第二个问题表现为东方主义的存在结构所具有的牢固的持久性。

我在本文中“地域研究”的定义包括两个指标，一是研究对象为AALA诸国，二是包括

要求国家政策变更内容的、原则上具有国策研究性质的研究。如果以此为前提的话，“地域研究”就是指那些以 AALA 诸国为研究对象，而且具有按照本国的国策来改变研究对象国家状况的主观意图性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有改变状况的意图，那么就必然经常性地存在着带有特定目的和意志的价值判断。进而，不论这种价值判断的细节如何，从总体上来看它必然带有与本国的价值判断一致的特征。

问题在于，试图改变研究对象 AALA 诸国状况的研究主体，本来应该是 AALA 诸国的人们，作为外国人的“地域研究”者肯定不可能成为改变对象地域状况的变革主体。除了对 AALA 诸国的人们依据自己的价值判断而改变现状的行动进行帮助以外，地域研究者不应该有其他行动。但现实是许多地域研究者超越了这一界限，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政策实践方面以变革主体的角色对研究对象国家的状况施加影响。当此之时，如果地域研究者是国策指向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遵循本国的价值判断的情况下，以从事政策制定的形式来试图改变研究对象地域的状况。

更严重的问题是，研究者本国的价值判断与研究对象国家人们的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不相容的状况。或者说研究对象国家内部的各主体之间存在着价值判断的相异和对立，在其中的任何一种与研究者本国的价值判断一致时，研究者就有可能对其进行单方面的支持，结果卷入其内战，甚至扮演内战导火索的角色。

而在地域研究将研究对象国家人们的存在加以客体化的同时，也常常会使自身的主体作用过分膨胀。导致这种主体膨胀的原因在于现代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共同存在的方法论弊端，即将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进行主客分离，而且将主体置于客体之上。现代科学并不将研究对象看作与研究者本人同等的主体来把握，而是看作经过操作（加工）重新构成的客体。也就是说，明显存在着承认自己的主体性却不承认研究对象的主体性的态度（behavior）。

现代科学的认识结构中存在的这种主客分离的状况，同时也表现在存在结构中，也即将 AALA 诸国客体化，而将欧、美、日列强主体化。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东方主义结构的源流。20 世纪以来，当现代科学与现代技术一体化而被统称为科学技术，这种结构便超越了认识结构而进一步增强了其存在结构化的倾向。也即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强化了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

在地域研究者所属的国家大多具有霸权（Pax）性质、依据自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而对 AALA 诸国的状况进行操作和意图改变的情况下，上述特征就表现得更加明显。例如在地域研究诞生之前的战争时期，为实施对 AA 地域⁵⁵的殖民地经营和军政统治服务的日本、欧美的“亚洲研究”者、“支那研究”者都属于这种情况。进而，在二战结束地域研究勃兴之后，美国的地域研究者们也表现得较为明显。

就战败之后的日本而言，在追随美国的情况下，日本国家类同于过去的霸权受到了限制，带有上述主体膨胀性态度的研究者表面上似乎不存在了。但是如同前文所见的那样，出现了出于自

55 由于亚洲和非洲的大多数国家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而非独立的国家，这里将其统称为 AA 地域。

己的目的性价值判断而试图改变 AALA 诸国的状况的研究者，虽然主要限于言论层面。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特别是当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的“国际贡献”成为话题，日本的地域研究就不再止于言说，而是朝着国策性的伴有政策实践的研究方向演进。当然，由于继续标榜超越意识形态的实证主义研究，大多数研究者对于自身的研究实际上带有目的性价值判断这一点缺少自觉。

这里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在于，试图改变研究对象 AALA 诸国状况的地域研究者的目的和意志自然包含着价值判断，而这一判断恰恰表现为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第二点是，进入后越战、后文革时代之后，在实证主义名义下研究者很多认为自己的研究应该而且能够排除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所导致的认识弊端。当然，也正是这一类研究者反而难以自觉意识到自身的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意志和价值判断，也因此缺少从方法论上对东方主义的自觉和自我抑制。

2. 代结语：新的范式——“共同态度性”的提倡

东方主义得以顽固地延续至今的原因在于，同过去相比，对自由主义 = 现代主义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扩张”来实现其全球范围的胜利表示怀疑的人剧烈减少，与此同时，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不仅在欧美世界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内部都强势复活。萨依德和柯文曾经指出，60 年代以后全球范围内兴起的“现代主义”批判运动和言说本身存在着西欧中心主义性质的东方主义结构，而进入 90 年代以后，“现代主义”批判本身也大幅度衰微，东方主义重新复活，而且进一步强化。

必须承认，只要“地域研究”自身仍然陷于上述两点为主的多重困境中，要从地域研究内部彻底扭转这股潮流是异常困难的。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提倡，应该通过确立“国别学” (nation-studies) 来取代“地域研究”所指的 AALA 诸国研究，也即中国研究成为“中国学”，印度尼西亚研究成为“印尼学”，如此等等。而确立这种国别学有下述三个前提。

第一，必须承认，作为研究对象的各个国家的各种主体，如国家、企业、个人、集团（地区居民、NGO、学术团体）等，具有依据自身的目的性价值判断来从事本国变革的主体性，而且这种主体性与作为外国人的“国别学”研究者的主体性处于同等位置。而针对各种主体构成的这种状况，作为外国人的研究者也具有自己的目的性态度（价值判断与行为）。

第二，研究对象各主体与研究者自身这一主体之间，各自的目的性态度相互联动和影响，任何一个主体的态度都难以单方面地操纵其他诸多主体的态度。这里将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联动性称之为“共同主观性”或者“共同主观的存在结构” (structure of the being on inter-subjectivity)。外国研究者这一主体当然也受控于这种相互联动性。

第三，上述诸多主体的目的性态度（行为）之间的相互联动性不仅表现为相互协调、相互结合，也可能相互对立。在这种相互联动的“共同主观性”中，东方主义的弊端就会因为西方中心主义性质的价值判断这样一面互相映照的镜子的存在而原形毕露。外国研究者进入这种辐辏而成的“共同主观性”的相互联动性之中，必须探明东方主义的认识结构和存在结构，从中发现研究课题和解决方法。

只有形成以上述三点为核心的方法论框架，“国别研究”（nation-studies）才能成立。在此将这一方法论称为“共同态度性”（co-behaviorism）

日本过去的中国研究也带有地域研究中存在的同样问题，也即作为研究主体（在中国看来是外国人）的日本研究者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之间存在着主客分离，而且主体被置于优越于客体的位置。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是与研究者一样带有目的意志的主体这一点受到忽视，中日之间存在的作为“映照彼此的镜子”而带有相互联动作用的“共同主观性”这一事实也就因此未能在方法论上加以注意。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作为镜子的“共同主观性 = 共同主观的存在结构”在历史进程中并非静止不变的（static）存在，而是同时代一道变动不居的动态的（dynamic）存在。正因如此，共同主观性这面“镜子”才会随着时代的演进而产生一定的“歪曲”。⁵⁶就目前而言，最典型的歪曲莫过于“东方主义”。从本质上说，由于共同主观性本身的不断变化，这种歪曲也不可能被完全而且永远地消除。因此，从方法上来看，在由于这种变化而镜子出现“歪曲”的时候，就需要针对具体情况而进行适时调整和修正的新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以上述三点为前提的“国别学”的方法，也即“共同态度性”。

Behavior 可以翻译成“态度”。“态度”是人们针对具体状况时的姿态和行为，包含着立场。也就是说，人们的基于价值判断的目的和意志在起作用。这里以中国发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为例来加以说明。

2005年，长江流域某县发生了一起因当地化工厂排放含有氯化物的废水而引起的严重水污染事件。那家化工厂是当地县政府招商引资的企业，位于长江的一条支流岸边。该事件造成了当地居民的健康损害，并引起了激烈的抗议行动。但是对于县政府来说，那家化工厂是县财政的重要税收来源，失去这一财源将导致许多严重后果。县政府当然知道中央政府对污染问题的严厉政策，因此以县环保局为主采取了一些看上去较为积极的调查和限制措施，以淡化事态。位于该县的一所大学的环境学家也参与了调查。但县政府同时也对居民的抗议行动采取了高压手段。而巧合的是，在事件发生时，某一个外国的研究小组恰好在该县环保局的协调安排下从事当地的环境问题调查。后来他们将调查结果在本国召开的学术会议上作了报告，其结论认为，该县的水污染状况远远超过了环境标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必须严格执行环保法，但是由于中国普遍存在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要加以解决非常困难。

在这一事例中，主体构成包括化工厂、当地居民、县政府、当地大学的学者、中央政府，以及外国的研究者。各个主体都表现出各自的立场、行为、价值判断或者说带有一定的目的和意志的态度。其中的一个问题在于，各主体之间的目的性态度既有相互协调的部分，也有排他性的严重对立的部分。比如县政府和化工厂的关系是明显地结合在一起的，甚至被怀疑有着贿赂关系，而作为外国人的研究小组的目的性态度，尽管主观上有着希望状况改善的意图，但其研究的根本

56 广松涉在70年代初从胡塞尔哲学中发现“共同主观性”的重要性并开始使用时，对其动态变化的侧面未能充分关注。见前引广松涉《世界的共同主观性存在结构》。

目的在于对本国学术界的“贡献”，因此不会对构成上述状况的主体间的动态关系表示关注。当然，对于为外国研究小组的调查提供了方便的县环保局来说，虽然该项调查结果包含着当地的具体事例，但其结论不过是关于中国环境问题的一般论述，而且由于研究报告是在研究者所属国家的学术界进行的，因此无关痛痒，反过来说甚至还可能以其调查结果为依据向中央政府提出增加环境保护经费。

总体上看，在学术研究领域，特别是研究对象国家的国内研究者的目的，有可能与其他研究者的目的相互排斥和对立，或者说与国家或地方权力的政治、政策目的发生对立。在这种情况下，虽说是学术研究，但基于研究者的特定的立场和政治影响力，其受到压制甚至封杀也是不可避免的。

上述诸种状况构成了各种主体间的“态度”的对立和协调等相互联动作用。所谓“共同态度性”就是将这种相互联动性经常作为中心视角来展开研究的一种研究方法。当然，这一视角必须将研究者自身的“态度”看作是与其他主体的态度同等的。只有如此，对于自己的研究结果的“社会责任”问题才能被自觉地意识。

这种“共同态度性”的研究视角，当然不仅适用于日本国内核电站的安全问题、福知山铁道的列车脱轨事故，也必然适用于日中关系、国际经济和政治关系，乃至文化摩擦等多种问题的研究。